

10月9日,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



# 末世恐惧中仍彰显艺术力量

##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



拉斯洛于31岁出版长篇小说《撒旦探戈》,备受文坛赞誉。1986年,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问世;1987年,拉斯洛凭借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移居柏林,并在那里获得了国际文学圈的关注。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

他被称为卡夫卡式的作家,其标

志性的长句让读者印象深刻。他的影响力还来自电影,很多文艺片影迷熟悉的电影《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就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

拉斯洛出生于1954年,是广义的欧美历史中的“婴儿潮一代”(Boomer),二战结束与经济上升的乐观情绪往往成为他们写作动机,冷战的威胁与社会、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又让他们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反叛、摇滚与自由文化泛滥左右着作家的思想。

婴儿潮一代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之前那场“世界末日”般战争经历的影响之上,他们的思想通过存在主义,或者加缪的“荒诞理论”来表达,希望与灾难彼此悖论地并存于拉斯洛所有的作品里。今天的欧洲文化中,也正经历着一场悄然的抢救“婴儿潮一代”文学遗产的活动,相对于历史叙

事的丰沛,文学很容易沦为一个被各种本体论框定的历史书写的“注释”——我们对于这段文学经验所知甚少,而这个“甚少”却又路径如此相似,表达如此雷同。

是不是在今天的欧洲,授予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诺贝尔文学奖,会让读者重新审视曾经被称作“野蛮大陆”的欧洲,和它短暂的20世纪。

拉斯洛生于匈牙利久洛,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旅居匈牙利的翻译家、拉斯洛作品的主要译者余泽民曾回忆,自从拉斯洛1991年以记者身份前往中国之后,便深深迷恋上中国,不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家后还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他尤其迷恋《道德经》和李白,余泽民也曾陪伴他在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

据澎湃新闻

## 《撒旦探戈》



《撒旦探戈》的时间跨度不过几天,场景也寥寥无几,讲述了一个破败的小村庄,十几个无处营生的村民在阴雨连绵、泥泞不堪的晚秋季节里上演了一出酗酒、通奸、偷窥、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冷漠与麻木残忍地虐杀着一切生机,直至两个骗子的出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引领他们迈着周而复始的死亡舞步,走向想象中的光明未来……延绵不断的阴湿,闷声不响的残忍,让人头皮发麻的绝望贯穿全书,一个个克拉斯纳霍尔凯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绕,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

## 《反抗的忧郁》



小说围绕主人公艾斯泰尔夫人、弗劳姆夫人、年轻人瓦卢什卡等数位人物,开展了一系列碎片化的故事描述,多方面呈现了匈牙利小镇的混乱事件:一头巨型鲸鱼被马戏团运送到城镇上,围观者各自怀揣着不同的动机和意图。不久之后,镇上谣言四起,有消息称,马戏团的人正默默酝酿着一个邪恶的目的,受惊的市民紧紧抓住他们能找到的任何秩序的表现形式进行批判——音乐、宇宙论、法西斯主义,等等。有作家评论这是一本阅读门槛很高的书,也是一本悲观的书,是作者对匈牙利内部革命的讽刺。

## 《仁慈的关系》



《仁慈的关系》是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包括其代表作《茹兹的陷阱》《理发师的手》在内的8个故事。他的作品晦涩艰深,主题阴暗,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派小说。故事中的句型结构怪异,地点含糊,意思难以捉摸,情节跳跃性极强,结构常常呈放射性,叙事者总是模糊不清,结局充满神秘意味。但是,译者余泽民老师为作品所作的序十分精彩,不仅详细讲述了作者的创作历程,也用基于自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剖析了拉斯洛那近乎疯狂的“中国情结”,毫无疑问,这将拉近读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

## 末日恐怖,天使瞪目

### ——拉斯洛作品评析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然揭晓,花落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拉斯洛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东南部边陲小镇久洛。1985年,他的小说首作《撒旦探戈》问世即奠定了其在当代匈牙利文坛的地位,并于当年获得德国年度图书奖。

“在末日恐怖之中,重新申明艺术的力量。”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判词。早在上世纪,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就称他为“匈牙利末日大师”。他笔下的世界常被启示录式的末世氛围所笼罩:破败的村庄、失序的城市、毁灭在即的文明景观。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描绘的正是个末世般的荒原村庄——匈牙利大平原上一处偏僻聚落终日阴雨连绵,12个穷困潦倒的村民陷于绝望与混乱之中。行骗流氓伊里米亚斯突然回村,引得众人视他为救世主般狂喜地追随,宛如跳入一曲魔性的探戈舞步。然而,这场“救赎”最终被证明不过是魔鬼的诱骗,村民们在幻灭中走向更深的沉沦。在1989年的《反抗的忧郁》中,一具巨鲸尸体成为引发镇上暴动的奇异装置,人们陷入无所适从的恐慌。

克拉斯纳霍尔凯更进一步以超长句和全知视角,营造出令人窒息的末日氛围。“每天早上六点五十二分准时赶到溪水桥车站搭乘的长途汽车,于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郊区”,他的句子往往没有明确的句读,句内成分仅以逗号、冒号、破折号相连。英国译者乔治·西尔蒂斯曾形象地比喻,《撒旦探戈》的段落就像“缓慢流动的熔岩,构成一条漆黑的文字长河”。

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般,克拉斯纳霍尔凯高振翅膀悬挂于末日现场,始终睁大双眼,凝视人类灾难之堆。他以俯视视角写人性,将欲望、恐惧与骄傲

织入句端,每个角色似乎都悬于灾难与可能的救赎之间——他称之为“纪律化的疯狂”。1999年出版的《战争与战争》集中展示了他这种“叙事中的叙事”技艺,游移不定的言说主体不断被挤压审视,文字本身成为他试图阐释的“创造空洞又填充空洞”的“空洞”本身,世界从而无限坍塌为想象的一瞬。

有趣的是,“天使”本身就是克拉斯纳霍尔凯痴迷的意象。《战争与战争》的主角、地方档案管理员科林,沉迷于一部匿名古代手稿,而这部手稿的内容,也就是小说的叙事主体,是4位“天使般的人”在古城威尼斯、哈德良长城等集人类美与智慧“高贵价值”之地经历的种种奇遇。他在2025年的最新小说《天使从我们头顶经过》中,更是直接将“天使”作为小说标题。

菩萨低眉,以示见不得众生皆苦的仁慈;但作为他笔下反复召回的意象,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天使总是降临于末日现场,始终大瞪双目,作为历史废墟中的审视装置,逼迫个体在逼仄现实与超越性之间承受一道无法闭合的缝隙。2008年出版的《西王母下凡(笔者暂译)》里的“天使”,以“审视者”的力量潜伏在图像、光线与注视里,变成了让凡俗意识瞬间破防的凝视与光芒本身。而在他的最新小说中,在战争这一极端现实、正在发生的末日过程中,天使的经过不是赦免,而是一种被迫承受的清醒。正如他本人所说,“启示录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种持续的审判”——“艺术的作用”,只是在边界线上让我们承认“那的确有某种在远处的东西”。

写到此处,诺奖对克拉斯纳霍尔凯判词中的何谓“艺术的力量”、何谓“如何重新申明”,似乎也分明了。换句话说,克拉斯纳霍尔凯“艺术的力量”,透过他笔下“天使”的显形,既是艺术中的灵在,

也是现代性的检察官。它不授予救赎,只把我们放回废墟中央,要求我们直视。他的写作伦理中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执念,不避讳残酷真相,也不轻易媚俗地提供慰藉。他的长句与极度延宕的语流像一束不容转移的光,令读者无法通过段落与句号逃逸,在持续的注视中承受意义的迟到与逼近。

但也如作家哈里·昆兹鲁所评价的,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叙事同样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洪流”,以无比宏大的好奇心包容世间万象,而这种好奇心源自他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切与对“现实的真实”的执着。克拉斯纳霍尔凯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人类要直面当下的现实,不应逃避于未来幻想。他认为自己坚持的是一种“无妥协的人文主义立场”,用漫长而完整的句子容纳那些无法简化的人类经验。克拉斯纳霍尔凯所“重新申明”的那种艺术力量之所以举足轻重,正在于它所采取的形式——一种对现实深处持续观察与批判的方式。这种写作超越个人经验,直指人类文明结构中的病灶。

“句号属于上帝。”克拉斯纳霍尔凯如是说。凡尘俗世中那些需要巨大勇气才能表达的爱与痛,不可能被切割成短促的片语句读,只有不间断的长句才能承载我们这个支离破碎世界中的全部矛盾与丰富性。他选择以一种近乎史诗的连续笔触,来对抗现代生活碎片化、浅薄化的倾向。这正是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写作伦理所在:以克制而彻底的讲述,穿透历史和个体记忆的迷雾,试图寻找哪怕渺茫的真相。而在那无法闭合的缝隙之中,文学还能留下什么?这或许正是我们每年将一个晚上的精神关注投射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据《经济观察报》